

从中央领导同志的涉日论述看 中日关系的时代特征

张晓磊

摘要:客观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新形势下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领导人的重要论述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一组核心变量。通过领导人的重要论述这一视角可以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作出较为全面和准确的分析,同时也可以作为预判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依据。自2007年至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些重要场合就中日关系作出了多次重要公开论述,这些论述蕴含着对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判断。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日关系新形势下的三个时代特征:第一,世代友好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路径在变化。第二,正视历史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政治基础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日本正视历史的路径在变化。第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路径次序在变化。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新形势 时代特征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晓博

当前,客观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难度前所未有。尽管从两千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史的脉络来看,中日关系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前后开始向着“中强日弱”的历史常态回归,但这一回归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复杂的调整过渡期,如何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日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由于难度前所未有,对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认知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而认知出现偏差将会反过来影响

两国各自的外交政策取向,形成恶性循环,从而阻断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当前的发展态势关系到中日关系的未来。第三,从世界格局角度看,中日关系特别是中国本身已经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调整的重要变量,如果缺乏对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理性认知,结果可能会形成负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也是中日关系日益成为国际热点的深层次原因。

领导人的重要论述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一组核心变量。从主观层面看,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既与两国各自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也是双方不

断互动和关系调适的结果,而领导人的论述恰恰既是该国外交政策原则和精神的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也涵盖了两国就特定议题进行双边互动时的重要政策宣示和主张。因此,从领导人的重要论述这一视角可以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作出较为全面和准确的分析,同时也可以作为预判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依据。

2007年至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中日关系或日本问题的29次重要公开论述是在多个场合作出的,这些场合包括20次会见、7次出席重要仪式或会议、1次简短交谈和1次接受媒体采访。其中20次会见包括1次会见日本天皇、3次会见日本首相、2次会见日本外相、5次会见日本重要政党或议员联盟代表团、5次会见日本执政党党首、议院议长或前首相、4次会见日本地方知事;7次出席重要仪式或会议包括出席“9·3”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出席“9·3”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出席日中友好七团体及侨界四团体欢迎招待会、出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早餐会。这些论述蕴含着对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判断,而2007年至今的9年恰恰处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复杂调整过渡期,科学把握中日关系发展态势及规律在这一时期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一、世代友好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路径在变化

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损,这是被中日交往的历

史反复证明了的,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坚持将世代友好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目标是中国政府的长期国策。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会见日本外宾时曾经指出,我们要贯彻毛主席定下来、周总理领导实行的对日友好方针。^①1982年,他又指出,中日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是中国的长期国策。^②1987年,他再次指出,世代友好同日本友好下去的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③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指出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和表明中国将长期坚持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国策。2008年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前政要时指出,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09年他在担任国家副主席访问日本前夕和访日过程中多次指出,中国政府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从外交战略全局看待中日关系,坚持长期的中日友好政策。2010年与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座谈时又明确指出,中日两国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长期友好是唯一正确选择。2012年在会见日本民主党代表团时将“要扩大人文交流,实现世代友好”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启示之一。2014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再次指出,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④

尽管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但中日友好仍然是历史主流,“中日友好”和“中日之间的问题”仍然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早在1954年,周恩来同志会见日本外宾时就指出,从中日关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② 同上,第856页。

③ 同上,第1196页。

④ 《盘点: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2015年8月13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15-08/13/content_36295249.htm.

的历史来看,我们 2000 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① 1981 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中日双方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乃至一些困难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都是可以解决的,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局部的问题。^② 对于近年来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诸多问题,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的高度看待中日关系,坚持中日友好主流论。2014 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中日两国 2000 多年的交往中,和平友好是历史主流,中日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大局。2015 年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再次强调,中日一衣带水,2000 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③

如何维护中日友好大局,朝着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根本目标迈进,成为新形势下发展中日关系的首要问题,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上述问题指明了方向。首先,身体力行通过高层引领促进中日民间交流。近些年中日双方的政治关系与国民感情日益陷入互相形成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之中,越是在这个时候,两国的政治家越需要承担更多的国家责任,通过高层的政策调整和引导,止住两国国民感情不断下滑的趋势。早在 2011 年 5 月 5 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时就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开展中日各领域的民间交往,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而且也可以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内涵。2015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又指出,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

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代延续下去。^④ 在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局面的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力亲为助推中日民间交流的举动在日本引起广泛好评,赢得了日本民心,同时也创新了向日本国民宣示中国对日外交政策主张的良好方式,体现了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政治家高度的政治智慧。其次,将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前提和路径,规劝日本政府和政治家与我方相向而行。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的,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

二、正视历史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政治基础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日本正视历史的路径在变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多年的历史表明,日方坚持正确史观时,中日关系发展便会顺畅,反之中日关系则停滞不前,正确对待历史是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基本前提。邓小平同志早在 1987 年 5 月 5 日会见日本外宾时就表示,日本有很少一部分有政治影响的人还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这是中国人民所担心的,我们只担心这一点。^⑤

时至今日,正确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仍然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政治基础,对于坚持错误史观的日本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来说,历史永远不会翻篇。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明确

① 田恒《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49-750 页。

③ 《盘点:习近平 8 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 27 次重要论述》2015 年 8 月 13 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15-08/13/content_36295249.htm.

④ 同上。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0 页。

指出了正视历史在中日关系发展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并在多个重要场合规劝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正视历史。2013年1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日方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历史问题。2013年9月5日在同安倍简单交谈时强调,日方应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2014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表示,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有利于日本早日卸下历史包袱。2014年11月10日应约会见安倍时强调,历史问题事关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2015年4月22日应约会见安倍时指出,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①

随着中日关系迈入新阶段,日本日益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在此背景下,日本试图一劳永逸地卸掉历史包袱。2015年8月14日,安倍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企图以模糊侵略性质的方式在历史问题上蒙混过关。针对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和组织执意坚持错误史观甚至企图彻底摆脱历史问题的言行,中国的外交斗争途径也需要并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将针对日本错误史观的斗争上升为法定化、制度化方式。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每年国家举行纪念活动。这意味着抗战胜利和国家公祭日已提升至国家立法的最高规格。也就是说,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和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已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国家行动。

第二,通过领导人出席上述重要仪式并发表讲话的形式,对日本的错误史观进行有理、有力的批判。习近平同志分别于2014年7月7日、9月3日、12月13日、2015年9月3日参加四次与抗战或国家公祭日相关的重要仪式或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四次讲话仍然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一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将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区分开来,保持了政治家应有的政治理性。习主席在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二是重点批判日本右翼分子,对日本坚持错误史观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和批判,全面揭露了日本右翼政客们的丑恶嘴脸,起到了醍醐灌顶的警醒作用,展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历史担当。习主席在2014年7月7日纪念抗战全面爆发77周年仪式上发表讲话并强调,仍然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同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又指出,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依然在执意参拜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亡灵,依然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依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依然在挑战人类良知。

^① 《盘点: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2015年8月13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15-08/13/content_36295249.htm.

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路径次序在变化

无论从历史潮流发展取向还是中日关系的现实看,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政治基础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提供了根本支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是中日政府间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第四个政治文件是对前三个政治文件的继承和发展,是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因此可以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坚持以中日间若干政治文件为基础发展中日关系所取得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政治智慧的结晶。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联结着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对中日关系过去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中日关系未来的方向性展望。

从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四个政治文件和战略互惠关系更是推动当前中日关系克服重重困难并在曲折中前进的根本前提。在中日关系经历严重困难局面的背景下,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在多个场合不断向日方提醒和重申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意义以及中日关系的这一基本定位。2013年1月25日,习近平同志与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会谈时指出,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同年9月5日,他在与安倍会面时又强调,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14年9月3日,他在出席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又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2015年4月22日,他在应约会见安倍时再次指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①

当前,随着中日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中日关系客观上迈入历史周期意义上的新阶段,中日两国各自的外交策略也相应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都决定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路径需要也必须有所改变,如果过去的推动路径是充实战略互惠关系内涵和深入发展甚至是锦上添花,那么现在的路径更像是重聚并扩大战略互惠关系共识甚至是具有止损性质的雪中送炭。列出并逐步消除影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负面清单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这一负面清单应包括哪些内容,从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1、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体现两国政治家真正的历史担当和国家责任,发挥首脑外交和高层引领的重要历史作用。2013年1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山口那津男时强调,新形势下,中日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2、日方承诺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日重聚共识的基本前提。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014年9月3日、11月10日和2015年4月22日多次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日本在同中国一起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沿此道路走下去,在军事安全政策上审慎为之,多增进同邻国互信,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3、增信释疑,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是开启重聚共识之路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25日会见山口那津男时指出,日方应同中方共同努力,正视历史、现实,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2015年4月22日应约会见安倍时再次强调,我们愿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共识。

^① 《盘点: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2015年8月13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15-08/13/content_36295249.htm.